

中國現代小說論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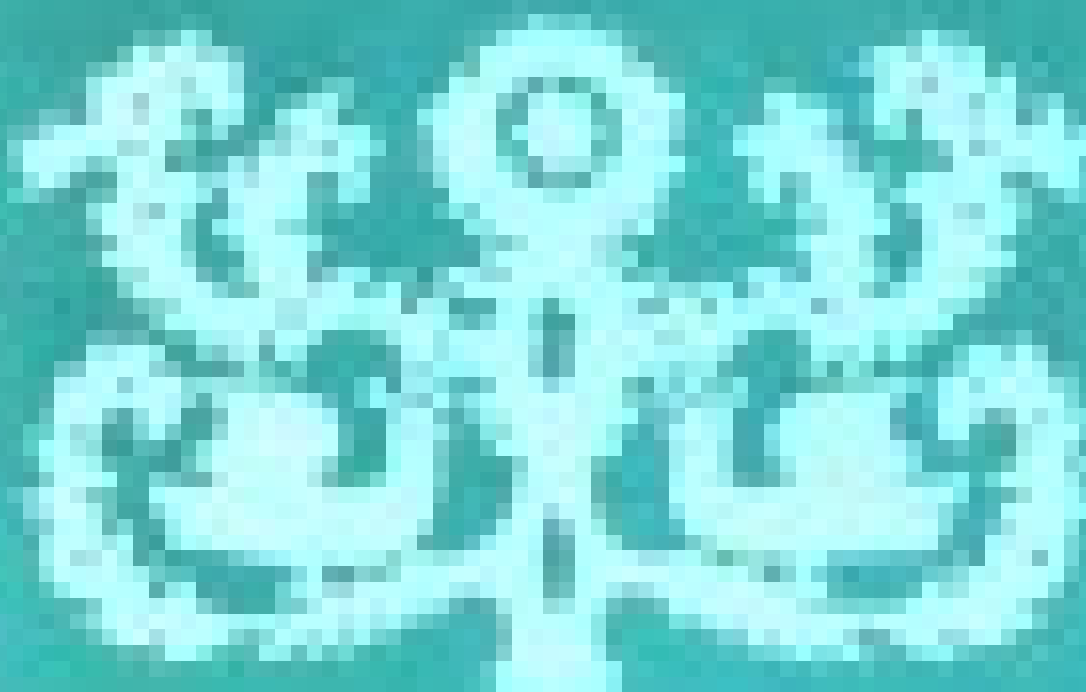
郭志剛 著
山西教育出版社



中国北方文化史话

第二卷

中国北方文化史话



472
中国现代小说论稿

郭志刚 著

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太原并州北路11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 字数：372千字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7—80578—470—1

G·464 定价：5.25元

序 言

这个集子里的文章，除谈赵树理、周立波、柳青、欧阳山的四篇讲义外，均已正式发表。这次收集的时候，我做的一件最大的工作，就是找出原稿，在没有注明写作日期的文章后面，重新注上写作日期。这是因为，在一个多变的时期内，一个人的言论价值及其确切含义，常常需要时间老人参与判断。譬如说吧，十年前听起来顺耳的话，今天就未必那么顺耳了；今天看上去是对的那些话，也许十年前正受着一些人的批评。在对我国现代文学进行的评价中，特别容易发生这类情况。

这并不是说，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是非没有客观标准。不，真理是有客观性的。这只是说，人们对真理的认识，常常需要时间的帮助。

我国现代文学从诞生到现在，才不过七十余年，而我写的集子里的这些文章，前前后后也经历了十来个寒暑了。我觉得，我们对现代文学所做的一切评价，都像立在巍巍群山脚下仰面看山，山上的一木一石，固然能够看得较为真切，但要看清全体可就难了——集子里有篇文章引述了苏轼的《题西林壁》，说的就是这么回事：“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何况，历史风云又是这样变幻莫测，它在人们脑海里投射下的种种飘忽不定的晴影与阴影，不仅会使同一时期各种人们的观点互相冲突，还会使同一个人以他的今日之笔去挾伐他的昨日之笔。这一切，在现代这段历史上是进

行得如此激烈，因而就特别增加了对现代文学进行的评价工作的复杂性。当然，所有这些，也都可以说是正常的，是革新。但是，人们也不难看到由某些合理口号掩盖着的荒诞性。

我的这些文章，也可以说是一种评价。我自然不敢自以为是，以为自己说的接近真理。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我缺乏这种自信，所以才希望读者能够联系不同的写作时间来读这些文章，以便做出正确的判断。我相信，读者将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分析这些文章的是非得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们读了以后发生同感、有所收获，我自然会高兴；但如能据实或秉公衡文，指出其中的缺点和错误，我将会更加高兴。因为一般说来，后者意味着更多的深思熟虑，因而无论对作者还是对读者，也都是更高层次上的收获。

集子题名“中国现代小说论稿”。这里说的“现代”，也包含着当代，尽管涉及到当代的，只是极小一部分内容。多年以前，听朋友说，某大学一位教中国古代文学的老教授，把多种新出的文学期刊列为自己的必读书目。这位老教授认为，搞古代的，即使不执当代教鞭，也应该时时追踪当代，以便从今天文学的最新发展中获取信息和资料，使自己的专业研究不断开辟新局，永葆生机。我觉得这看法很有道理。搞古代文学尚且如此，何况现代？此外，“小说”这一体裁，不可能孤立于其它体裁之外，独自发展。特别是那些在创作上全面发展的大家，我们是不能离开他的散文、诗歌等等，去孤立地研究他的小说的。对于一个时期的文学来说也是如此，例如，集子里有一篇文章，专门探讨了散文对小说的影响。这样看来，无论从时间或是从内容看，这个集子的实际涵盖面，都要稍稍超出狭义的“现代小说”的概念。

现在，集子总算编完了。对着面前这一叠剪贴完毕的厚厚的稿纸，我料定它又是一本赔钱货。本来，我是抱着微茫的希望和试一试的心情，同山西教育出版社的同志联系出版问题的。信寄

出后，过了一阵，没有回音。我怕对方为难，就又写了一封信，表示“撤军”。不料信刚发走，就收到了出版社同意出版的复信，并表示尽快发稿。这一意外收获，带给我的不仅是高兴，还有欣慰。我想，出版界并不总是都向“钱”看的，虽然现在还不是高谈阔论的时候。我和山西教育出版社的有关同志打交道已经有些年头了，因此深知他们提携作者的热心和对稿子的认真负责。当此学术书籍的出版仍在举步维艰之时，他们再次向一个作者伸出了援助之手，面对此番情景，正如我的欣慰超过了我的高兴，我的感慨也早超过我的感谢了。

集子里的许多文章，原是我给学生上课用的讲稿，这次编辑的时候，我仍然希望它能兼做专题课教材之用。因此，为了保持一本教材的相对完整，我把曾经编过集子的少量文章（主要是“拾穗小论”那一部分）也编进来了。此外，因书中各篇文章，系据原发表之报刊（或书籍）铅印件排印，注释及年月体例等容有不尽一致之处，谨此说明。

郭志刚

1991年2月1日

目 录

一、文学思潮论

鲁迅与传统文化·····	(3)
在现代与传统之间·····	(8)
——一个和写小说史有关的问题	
关于走向世界·····	(15)
关于三十年代文学的价值观·····	(20)
生活比理论丰富·····	(26)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现代散文对现代小说的影响和渗透·····	(34)
也谈性格的辩证法·····	(51)
应试五题·····	(57)
作家的思考与创作的繁荣·····	(67)
作品的境界与作家的责任·····	(82)
情节的构思与提炼·····	(94)

二、作家作品论

五四时代的冰心·····	(105)
现代启示录·····	(111)
——读冰心的两篇小说	
“东方式的反省”·····	(120)
——论许地山小说中的文化意识	

许地山创作中的哲理化特点·····	(138)
论鲁彦创作兼及关于鲁彦创作的评论·····	(152)
勇敢者的探索·····	(178)
——论丁玲的文学道路	
勇于向读者敞开感情世界的人·····	(200)
——《丁玲创作谈》序	
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优秀长篇——《围城》·····	(204)
再论《围城》·····	(211)
他代表着一个文学的时代·····	(230)
——谈赵树理	
周立波和他的《暴风骤雨》·····	(249)
柳青和他的《种谷记》·····	(266)
欧阳山和他的《高干大》·····	(278)
时代塑造作家·····	(290)
——论孙犁的道路	
论孙犁作品的艺术风格·····	(316)
深刻而高尚的回答·····	(345)
——读舒群同志近年来的小说	
《黄河东流去》的主题思想和人物塑造·····	(359)
略谈《故土》的得与失·····	(371)

三、拾穗小论

读鲁迅小说的一点体会·····	(381)
叶圣陶的教育戏剧与小说·····	(386)
庐隐创作中的社会信息·····	(392)
萧红和叶紫·····	(399)
《骆驼祥子》及其版本和故事的变化·····	(410)

“过后思量总可怜”	(420)
——茅盾的《腐蚀》	
人间地狱的三面镜子	(426)
——巴金的《憩园》、《第四病室》、《寒夜》	
从《长夜》说到《火灾》	(433)
两篇别具一格的爱情小说	(439)
谈作家的感觉能力	(443)
用孩子们的眼睛观察世界	(448)
新的呐喊	(454)
——读《美女陈情》	
《人到中年》与知识分子问题	(457)
心弦上的歌	(461)
——读《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为真、善、美唱的一支歌	(465)
——读《远去的白帆》	
让光明升起来	(468)
——读《晚霞消失的时候》	

一、文学思潮论

.....

.....

.....

鲁迅与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是历史的创造物，它在总体上反映着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精神状态和文明程度。举凡一个民族在长期生活实践中积累和沿传下来的一切文化艺术典籍，甚至还有反映着这个民族生活和思维方式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等，都可以归入传统文化的范畴。传统文化的包容如此之大，以至历史的精华和糟粕并蓄于一体，恰如一条滚滚奔流的大河，不免泥沙俱下。正因为这样，人们可以举出一百条、一千条理由批评它，也可以举出同样多、甚至更多的理由赞扬它。所以，问题不在于批评和赞扬本身，而在于批评和赞扬的是什么。

但是，当有人提出整个否定或基本否定传统文化的时候，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例如，有人主张“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在持这种看法的同志中间，有人把“西学”解释为“马克思主义”。这也很难自圆其说，因为：

一、“西学”和“马克思主义”是两个互不等同的概念；二、在整个文化建设中，马克思主义的作用也不能用“体”来概括）。也有人认为应将“封建文化体系”彻底打碎，再从中择取养料，等等。这些同志可能出于百分之百的建设中国新文化的良好动机，但这样做的效果，恐怕是百分之百的事与愿违。理由极简单：谁也无法割断历史。塞万提斯在他的《堂·吉珂德》自序里说，任何事物生出来的孩子都要像它自己，这是天道自然，颠扑不破的。这话也可以这样理解：在传统的无限连续性中，每个事物都像它前面的那个事物，因此，历史上和现实中存在的一切事物，都可以在传统的链条中找到它的“根”，都不能离开传统而存在。所谓“像”，并非照搬，这里有变革，但变革必须以承续（“像”的部分）为出发点，否则，变革就失去了依据，成为无中生有，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主张“西学为体”或“打碎”传统文化体系的同志，大都拥护建立民族新文化，但这二者之间，恰恰互相抵触，如果依了前者，就像沙上建塔，归根是建立不起来的。远的不说，假定“西学为体”或“打碎”的说法在两个多世纪以前实行，就不可能产生《红楼梦》；假定这类说法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实行，也不可能产生鲁迅。或问：打碎传统文化体系，虽然不能产生《红楼梦》，但产生《人间喜剧》那样的作品，不是也很好吗？可惜，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一部缺乏民族特色而能卓立于世界名著之林的作品，而民族特色的形成，离不开自己的传统文化。

有人以为鲁迅是反对传统文化的。根据这种认识的逻辑，他们还会认为，鲁迅就是在打碎传统文化体系的前提下产生的。这里有很大的误会。因为鲁迅反对的是传统文化中阻碍社会前进的糟粕，并非整个传统文化，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一系列古代作品的肯定，也无法理解他对其它文化典籍的悉心搜集，以及对民间文艺（这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的热爱。事实上,鲁迅一直没有放弃对传统文化中那些优秀部分的研究与借鉴,其中,甚至有不为一般学者注意的作品。例如,对晚清《海上花列传》和《海上繁华梦》这两部写得并不算很好的长篇小说,鲁迅在1924年致胡适信中,就仔细地比较和估量过它们的价值:“自从《海上繁华梦》出而《海上花》遂名声顿落,其实《繁华梦》之度量技术,去《海上花》远甚。此书大有重印之价值……”这里,有的是慎重的挑选和鉴别,哪里有“打碎”的影子呢?鲁迅虽然声言过他写小说是靠了自己读过的百来篇外国小说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我们却不能据此认为,他的小说没有受惠于传统文化,因为下面这些话,同样反映着他的观点:

“新的艺术,没有一种是无根无蒂,突然发生的,总受着先前的遗产”,“古人所创的事业中,即含有后来的新兴阶级皆可以择取的遗产”。正如他论述陶渊明的时候说:“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现在之所以往往被尊为‘静穆’,是因为他被选文家和摘句家所缩小,凌迟了。”倘若我们只取前者(尽管它也许更为鲁迅所强调)而无视后者,否认鲁迅小说和传统文化的有机联系,不是同样犯了“缩小”和“凌迟”前人的错误吗?我们知道,鲁迅的小说创作,不只在技法上特别重视我们民族传统的白描手法,而更重要的是在气度、神韵上,表现着我们民族的伟大性格。这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从小说的创作或抒情主体即作者自身来说,他是以“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在新文学的战场上进行呐喊、创作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的正气、骨气和坚忍不拔的探索精神,在鲁迅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种充分体现着民族精神的思想、风采,必定挥洒于他的创作之中,构成他的小说的最鲜明的美学特征和个性气质。这些特征或气质,决不同于任何欧洲小说,尽管他的小说是因为受了前者的启发应运而生

的。二、从鲁迅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首先是农民）身上，我们也能看到鲁迅所热爱和赞赏的东西。闰土、祥林嫂、七斤、阿Q……虽然落后、麻木，但不失劳动者纯朴、善良的本质，至于《一件小事》中的人力车夫，《社戏》中的双喜、阿发以及六一公公等，或因其正直、无私，或因其率真、热情，已经成为鲁迅讴歌的对象了。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常常反映着传统文化中的深层东西；恰恰从这里，我们看到作者将我们传统文化中反映于人物心理上的不同素质——消极的和积极的，都是区别得非常清楚的。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进程中，鲁迅对传统文化采取了比较严厉的批判态度。他认为“中国古书，叶叶害人”，因此劝青年多读外国书，少读、或竟不读中国书。有的同志在这些地方找到了鲁迅全盘或基本否定传统文化的根据。对此，我们仍须倾听鲁迅本人的意见：“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五四”时代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著名口号，一方面，这个口号在当时具有重要的革命意义，因而它很有号召力，带来了我国现代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思想解放，使思想界和文化界出现了空前深刻的革命；但另一方面，这个口号在科学性上还存在着不足，还有片面化和绝对化的地方，所以孔家店并没有被整个打倒，孔子学说中的合理部分，至今仍然受到尊重。这是一个“矛盾”，这个“矛盾”反映了时代的局限，反映了那时的先驱者们，还没有成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科学方法，这也就是后来历史总结的形式主义的缺点。鲁迅属于伟大的“五四”时代，他在文化战线上的一切活动，最坚定地体现了“五四”时代的正确方向，但也不可避免地反映着时代的某些局限。“五四”时代既然存在着形式主义的缺点，我们尤其不能“形式”地去理解鲁迅文章中的个别结论。这样，我们就能够较为清楚地认识鲁迅关于中国书“叶叶害人”

和劝人不读中国书的实质了。归根结蒂，当时鲁迅主要针对时弊、有感而发的这些言辞，有着具体的规定性，如果当作普遍性的结论，那就像用陶诗的“飘飘然”去否定它的“金刚怒目”式一样可笑。其实，就是看一看事实（这些事实应该包括《鲁迅日记》中附的“书帐”，其中自古籍到金石拓片、水墨画册，几乎无所不有），也不能当真认为中国古书一无可取，必须丢掉。

客观地说，即使“五四”时代，也没有把整个传统文化一脚踢开，因为如鲁迅所说，“‘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不能有截然的分界”。当时拥有会员最多、影响最大的文学社团之一“文学研究会”，就在它的简章中，把“整理中国旧文学”和“创造新文学”，以及“研究介绍世界文学”，共同列为该会宗旨。鲁迅是这个社团的支持者，在所有这三个方面，他都作出了表率。顺便说一下，在积极实行对外开放的今天，这三个方面也是密不可分、缺一不可的。为了打破封闭状态，继续清理传统文化中一切落后、保守的东西，完全需要进行反思和批判，但不需要重复“五四”时代某些形式主义的思维方式，更不应从那时本来还正确的立场上退回来。我们不是传统文化的盲目崇奉者，但应像鲁迅那样，尊重历史的辩证发展：“一道浊流，固然不如一杯清水的干净而澄明，但蒸馏了浊流的一部分，却就有许多杯净水在。”文化的发展，也是这样不断“蒸馏”的结果。临末，让我们看看和鲁迅同时代的另一位作家——许地山的意见，作为我们在文化问题上的一个“参照”：“古往今来，多少民族丢了他们宝贵的文化产品，都由于不知爱惜，轻易舍弃……外来的理想与信仰只可当做辅成的材料，切不可轻易地舍己随人。”否则，“一代一代自行摧残，民族的特性与特色也逐渐消灭，至终连自己的生存也陷入危险的境地。”这位作家，是把拥有自己的典籍和艺术作为造就伟大民族的第一条件的。

1987年4月2日

在现代与传统之间

——一个和写小说史有关的问题

这里，我想讨论一个和写小说史有关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当我国小说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之后，反映的生活面扩大了，水平提高了；但是，与此相应，读者面是否也扩大了、读者对小说的兴趣是否也提高了呢？如果没有，或者有些相反，除了读者方面的原因外，创作（包括理论）本身还存在什么问题呢？总之，生活面扩大、水平提高，这是成就；读者层面和兴趣能否与之同步发展，这是效果。成就和效果未能完全统一，是我国小说跨入现代阶段以后长期存在的一个矛盾，它反过来说明，在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中还有着不足，还有亟待弥补的缺陷。我的问题也许幼稚，也许不对，但我希望有一部新的小说史来回答这些问题。《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体系宏大，也许由它来回答这些问题更容易求得令人满意的答案。

既然是讨论问题，提出问题的人也免不了